

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

WENXUE WENBEN JIBENWENTI YANJIU

◎ 李长中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阜阳师范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国家图书馆 (CIP) 数据在案

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

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

WENXUE WENBEN JIBENWENTI YANJIU

◎ 李长中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李长中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660 - 0307 - 2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4764 号

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

作 者 李长中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307 - 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新时期以来，出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巨型寓言”的需要，中国特色文艺学知识生产在追求现代性进程中，无论是学科建构、知识结构、话语范式，还是研究方式等方面都取得质的突破。但是，由于存在贪“新”求“洋”的“大跃进”心态，以及根深蒂固的“工具论”意识，使文艺学知识生产过于关注体系、理论的建构，范畴、话语型的转换，真正具有“本土意识”、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至今仍呼之难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研究往往显得滞后、保守和封闭，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及应用批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功能失调；文学理论研究的数量与质量、话语与应用之间，缺乏相应的良性互动，理论界普遍存在“拉郎配”式的浮躁风气，文学批评也在“唯新是从”和“追风赶潮”趋动下，为适应各种理论潮流和新式方法而进行不间断的调整，文学批评成为外来理论的操练场，无论在批评策略、批评方式、批评文风等方面，都缺乏自身的学术原创性，对象源自中国，但提问问题的动因、解答问题的方式、研究问题的角度、得出问题的结论，却几乎都是外来的，从而导致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深度和力度。尽管在争取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合法性方面功不可没，但对该学科的未来也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目前，文学理论已丧失了对“文学”和“现实”发话的权力和勇气（不管承认与否），文学理论存在双重的边缘化。特别是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正处于传播方式电子化、信息编制数码化、交流对话网络化的空间优位状态

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突显理论建构的复杂化与艰巨性。因此，怎样建构具有中国问题、本土意识的文学理论体系和批评理论，远非一个简单易行、清晰可见的问题。

米勒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一文中对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有一个堪称经典的概括：“自 1979 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①长期的“内在研究”理论及研究心态的缺失，使我们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始终走不出“漂泊无根”的境遇，文艺学研究的“外转”恰好为我们的缺失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借口，文化研究成了当前文艺学知识生产中最活跃的话语类型。但是，我们偏偏忽视了（或者说故意误读了）米勒所谓“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蕴含的另一层信息，西方文学理论的“外部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处理的是语言与外部因素的关系。缺乏对文学语言问题的关注，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被异化的文化研究几乎全盘代替，逐渐丧失了“文学”这一根基。在这种语境下，一种曾被理论抛弃、被认为是单纯“内部研究”的理论建构走向被重新激活，在双重层面上为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批评话语的结构性转换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坚持回归文学自身，强调在不忽视文学的文化化基础上，重新考量文学自身的理论价值，从而为人们揭示出脱离文本的其他理论和批评话语的局部性和局限性

①（美）J·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M]，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16页

设置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视角；另一方面，文本视角的介入，又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再次转向提供了新机遇。这一理论建构走向就是“重回文本”，强调“文本意识”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

文学理论的创新应源于文学文本观照方式的创新。本书选取“文本”作为研究的立足点，以此作为透视当代文艺学研究现状中的突显问题及建构的逻辑态势，建立一种可供既有理论相互交流的对话平台，在相近或相异论题的撞击下验证既有知识结构在当下的适用性，作为获得知识性思考的潜在前提，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逻辑起点。诚如苏珊·朗格说：“要想对于一个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有关的所有概念做出可靠的解释，就必须先从解决一个中心问题入手，即先从确立一个关键概念的确切含义入手。”^①所以，本书意义上的“文本”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文本，不是“自足与封闭”的纯粹语言结构物，而是在突出“文本意识”在文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基础上，强化内部研究在文学整体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任何形式或任何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都必须从文学文本出发，在清楚文本内部的艺术运作机理及审美生成机制基础上，从形式到内容、从内部到外部，进行综合性文学研究，避免以往文学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忽左忽右、忽内忽外的弊端。

众所周知，当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在努力寻求文学自律特性、辨析文学的文本构成时，西方却正突破文学自律的藩篱，向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生态学进军；我们的文化研究正如火如荼时，西方的叙事学却迎来了“小规模复兴”……凡此种种，皆因缺乏对文艺学知识生产中根基性问题的关注，缺乏文本知识的储备和文本分析的能力，缺乏对文本内在机理的了

^①（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页

解，在一次次脱离文本的话语争鸣中造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实践的多维断裂，使当代文学理论难以形成持续而有效的话语运作规则和知识建构方式，所谓的知识创新、理论建构都是无个性、无知识增殖性的结构性重复。所以，以“文本”取代“作品”，既不是源于无深度的名词卖弄，也不是缺乏理论思考的概念翻转。如詹姆逊所言：“名目的出现总标志着新的问题、标志着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论争的题目，同时也不免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商品。”^①

理论知识产生往往基于以下两种方式：其一是知识内部的逻辑推演。例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建立在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各自遇到逻辑困惑基础上的。大陆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无限性，而经验主义则坚持感性是知识产生的基础，康德充分认识到二者的片面性和各自包含的合理因素，对人的认识能力展开批判性考察，建立起体系宏大的“批判哲学”；其他如黑格尔“理念”哲学的建立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其二，理论知识的产生源于现实需求。当理论所依据的现实、所面对的对象、所生成的语境发生改变时，原有的阐释语码、释意方式、理论规则便发生错位，捉襟见肘。这时，新的理论便呼之欲出。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来说，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的知识有效性、话语阐释力以及理论生命力应该来自于文学实践，当文学实践发生改变、创作成规发生根本性变迁，文学理论应随之而变、甚至超前预见某种变化而用以指导文学实践。如柏拉图为建立“理想国”而提倡“神灵凭附的诗”、海德格尔则希望在诸神缺席的时代，诗人们的歌吟应当成为本真言说及解放的主要方式……但是，当我们谈到“文学理论”时，往往存在“大文学”

① (美) 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序 [M]. 唐小兵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概念迷信，对“文学”所包含的文体差别不加辨析，单纯探索文学的“理论”，致使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忽视了对对象更迭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间的错位。

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中，诗、戏剧一直占据文学正宗（中国则是诗、词为正宗），所谓的文学理论不言而明就是“诗学”，对以“诗”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来说，它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等紧紧依据的是诗歌、戏剧等体裁，无需旁顾；自现代以来，小说作为“史诗和戏剧这两种伟大文学形式的共同的后裔”，按照伊恩·瓦特的看法，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笛福和理查逊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最早的其情节并非取自神话、历史、传说或是先前的文学作品的大作家”。他把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作为小说开始出现的标志，“当旧道德和旧社会的关系秩序被鲁滨孙·克鲁梭用个人主义翻腾大浪毁灭之时，小说的尚成问题的地位和现代思想的地位，才一道得以确立。”^①自此以后，小说成为占据文学创作的主导体裁，并且是正在“形成中的体裁”。结果是，建立在诗歌、戏剧基础上的传统文学理论一碰到小说，就表现得完全束手无策，对待其他的体裁论述起来得心应手，因为这是现成的定型的研究对象，十分明确，清清楚楚，这些体裁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整个古典时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稳定性和程式化，而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和派别所导致的各种变体都是表面的现象，不触及它们坚实的体裁骨架，就其实质而言，关于这些现成体裁的理论，直到今天也未能对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的话做出重要的补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至今仍然是体裁理论所依据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尽管有时这基础渗透至深，人们看不出来），只要不涉及小说，一切都很顺利，可是，一些体裁刚刚

①（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97页

发生小说化的现象，就弄得理论走投无路，面对小说问题，体裁理论不能不进行根本的改造。在巴赫金看来，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是“已死亡的语言”，而研究小说却像研究活着的语言，而且是年轻的语言，“这就造成了小说理论的极端困难之处，要知道这一理论本质上有着与其他体裁的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与其他正统体裁相比，小说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它难以同它们融洽相处，它在夺取文学中统治权，一旦它在那些地方获胜，其他旧体裁便要瓦解。”^① 尽管托多洛夫把一篇论述叙述学的长篇论文命名为《诗学：什么是结构主义》，其实已蕴含着“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发生了更替。

具体到国内的文学创作来说，晚清以来，西方的船坚炮利彻底击毁了大一统帝国的黄粱美梦，中国被迫进入后发现代性进程之中，传统的诗词歌赋难以表达天翻地覆的社会文化变革和沉重的社会主题，以“言志”和“缘情”为主题的诗词因难以应对整个社会现代性的强烈诉求而不得不退居文学边缘。梁启超开启“小说界革命”以后，小说取代诗词而成为“群治”之工具、“新民”之利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 因此，小说自此以后就成为最主要的文体形式，在文学整体框架内处于核心地位，占据“文坛的第一把交椅”，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的读者也最多。特别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受外来小说影响，作家们突破了传统叙事模式的制约，注重小说的“叙述圈套”，采用新技巧更新小说观念，国内小说创作几乎已与西方小说同步，但国内针对小说文本为中心的理论话

①（俄）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506页

② 陈平原、夏晓虹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4页

语囿于各种因素干扰没能得到健康发展。尽管伴随着理论话语的不断转型，话语模式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是，一种“失语”的焦虑却始终回应文艺学界的上空。多年的文论建构无论哪门哪派以及未能包括其中的其它门派始终没能取得令人宽慰的成绩、真正解决失语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所提出的方案、设计的策略、列举的问题（尽管有的方案、策略很好）由于没能注重各种文体间的差异，特别是针对小说的理论话语并没有随着创作实践的更新而发展，过于关注理论普适性而忽视了理论的“地方性”特征，试图以“大文学”理论建构来达到对各类文体的普适性解读，诗歌理论能否适合于小说研究、散文理论能否适合于戏剧研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文学理论因失去面对小说这一文体的阐释能力，批评话语显得空泛和不着边际；小说则因缺乏理论层面的指导，在形式创新及整体突破方面往往捉襟见肘。

不同理论是打算用以回答不同问题的，当一种文体取得霸主地位后，理论就必须积极或被动的补充或修正以前理论的解释，对当前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来说，怎样解决现实问题、保持理论自身的活力和生机，以及增强理论面对文本的阐释能力才是理论研究的应有之意。因为文学理论最终要回到文本才能得以检验或论证。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我们提出很多的建构策略结果并没有解决问题之症结。直到目前，我们关于小说的定义仍是“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把小说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生动的环境描写。”^① 缺少文本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撑，一方面，对小说解读缺少分析文本的理论话语，仅

①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99页

限于内容层面的分析，当面对人物淡化、情节弱化、甚至无情节、无人物的现代、后现代文本时或往往茫然不知所措、或径直越过形式层面单以思想内容而概而括之。一些现代主义文本被我们解读成：“异化的焦虑”，“资本主义病态”，“个人主义”等，而后现代主义文本则被解读为“语言狂欢”，“能指游戏”，“意义虚无”……等等。即使对现实主义文本的分析，如果脱离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难有深的开掘；另一方面，对文学理论来说，由于没有深入理解小说等叙事类文本特质，所谓的“中西对话”、“古今对话”、“多元对话”等学术构想，最终摆脱不了理论话语简短“旅行”的厄运，难有理论新质生成，犹如一个枪手在没有寻找到真正的靶子之前就拼命射击，结果不但浪费了无谓的子弹，还令射击者愤闷不平，哪怕他本来枪法很准。

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建构中，怎样进行“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融合，始终是文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内外融合”批评的典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视文本存在，运用美学的、人学的和史学的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谨严的理论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真正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理论。”^①但是，如果深入地考察就会发现，不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史学观点”很难全面地应用到当前文本的外部研究，而且所谓的“美学观点”由于所面对的对象是经典的现实主义文本，其关于“美学观点”的具体论述不外乎是：艺术的感染力、形象的生动性、文体的完善性、风格的鲜明性、情节的巧妙性、“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等，对文本的叙述手法、

① 董学文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页

结构模式、存在形态等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述。因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面临着一个重新语境化、重新问题化的过程；19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外部研究而丧失了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和人文性，出于对这一倾向的反驳，以童庆炳先生为首的学者开始倡导“文化诗学”，力图实现文本批评的内外兼顾的研究路径。但是，“文化诗学”更多地是一种宏观上的强调，远非在微观意义上对文本有新的创见，也难以做出扎实细致的个案研究成果。

故此，“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目的：一方面，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视野内，以文本为中心，深入考察文本的存在形态、结构模式、叙述机制及接受方式，为建构出内外融合、全方位分析文本的理论体系提供知识基础，并以文本为场域，通过理论的语境化、本土化转换，实现中西文本理论的对话和互补；另一方面，以文本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及未来建构走向，为有效解决当前文学理论“失语”现象提供思考路径。其理论基础是各种小说及叙事理论的综合和融合、其重点在于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现代化转换，其目标是实现理性化理论和诗意性理论的融汇贯通，达到文本研究的综合创新，进而与文学理论形成积极对话和互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文本问题	(1)
第一节 文本研究缺失与理论失语	(1)
第二节 当代文学批评困境中的文本问题	(30)
第三节 文本问题与文学研究基本关系	(59)
第二章 文学文本的存在问题	(80)
第一节 由作品到文本	(85)
第二节 文本存在形态的若干思考	(101)
第三节 文本存在问题研究的文学理论意义	(119)
第三章 文学文本的结构问题	(133)
第一节 文本结构：由线性书写到“空间转向” ...	(134)
第二节 文本空间结构的理论探讨	(150)
第三节 空间叙事学与空间理论：融合的可能与必要 ...	(177)
第四章 文学文本的叙述问题	(187)
第一节 文本叙述者问题再研究	(192)
第二节 文本叙述中的叙述视角问题	(208)

第三节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视角选择与文化阐释	(226)
第四节	当前文学书写的若干病象及其叙事特征 ..	(240)
第五章	文学文本的接受问题	(268)
第一节	读者：由接受者到叙事者	(270)
第二节	后现代理论视野下的“读者叙事”	(308)
第三节	“超空间”的后现代文本与读者的叙事策略	(333)
附录一	“自我成长式”叙述者及其叙述伦理——以《孔乙己》为例	(363)
附录二	双重文本的自我消抹——《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叙述声音	(380)

第一章 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 文本问题

第一节 文本研究缺失与理论失语

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学文论范式的消解，文论界开始产生严重的“失语”焦虑，“话语重建”成了理论界的共同吁请。关于怎样重建的问题，学者们开出了各种“药方”：如1980年代的“中西文论对话”、“古代文论的现代置换”，1990年代后的“多元说”、“全球化说”、“本土化说”、“民族化说”等，不一而足。尽管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生理论和新潮概念，但大都处于简单移植和生搬硬套阶段，表面众声喧哗，其实大多是“他者”理论的旅行或中国化翻版，“问题谈论的多、理论建构的少”、“罗列现象的多、深入挖掘的少”、“概念命题引进的多、切实解决问题的少”这一“三多三少”现象并没有减

少。文学理论犹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每人都想在其中冶炼出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各种概念、术语、命题的新鲜出炉正是这种不断冶炼的结果。迟至今日，却没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面向现实语境、解决本土问题、参与全球对话的批评话语。随着社会语境的不断转型、文化场域的日益更迭，文论话语反而越来越问题丛生，“失语症”成为目前文学理论界一个挥之不去的焦虑。^①

从根本上说，无论认同“失语”者抑或反对者，都对文艺学界的现状深为焦虑与不满，并试图在各自的知识体系内寻找建构的良方。一些专业于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者尽管不赞成“失语”的提法，如蒋寅先生就坚决否认“失语”的存在：“‘失语’这个命题是个虚假命题，中国文论根本不存在失语的问题，”^②但他同样提出：把古文论研究做成“历史”是唯一的途径，通过其文献的、个别的、特殊的和本土的呈示，“历史”既可以拯救当代文论缺失了的立场，恢复对一切文学的经验，还可以展示中国传统和古典的精华，保护地方性和本土性，抵制西方的模式延伸到中国。^③在这种观点看来，民族的文论只能产生于民族的

① 参阅拙文：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困境与策略选择的思考 [J]．文艺理论研究 2008 (1)

② 蒋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 [J]．文学评论 2005 (2)

③ 蒋寅：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 [J]．粤海风 1998 (9) (10)

土壤，只要坚持古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书写方式和传统思维方式就可以再造新的理论形态。但现实的语境还是使一些人意识到：坚守传统固然可以守护民族精华与传统文脉，却难以应对文论话语现代性的挑战，也难以面对新的文学实践，必须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钱钟文、张少康、杜书瀛、陈伯海等学者都认为，确实有必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置换”，因为当代文论仍然走的是“以西学为体”的道路，与古代文论不搭界。古代文论中的概念、范畴只有经过语境化的当代性转换，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发现、开掘和阐释，才可能生成新的文论新质。

所谓“现代转换”，实际上就是用“当代性”来审视古代文论，对古文论遗产的转换和阐释必须“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并且要“结束那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在学术思想上，避免那种绝对对立的、独断式的思维”。^①然而，究竟该怎样的“现代转换”、如何“当代阐释”？谁找到了一条切实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建构路径，谁又在此基础上“转换”了能够融会中西的概念或命题？这种尴尬使人不禁想到20世纪初中国文论曾有过的困境：“五四”时期随着大规模的新文化建设，西方文艺学不管何种流派被“他们发明，我们模仿”的海纳百川式精

① 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1（1）